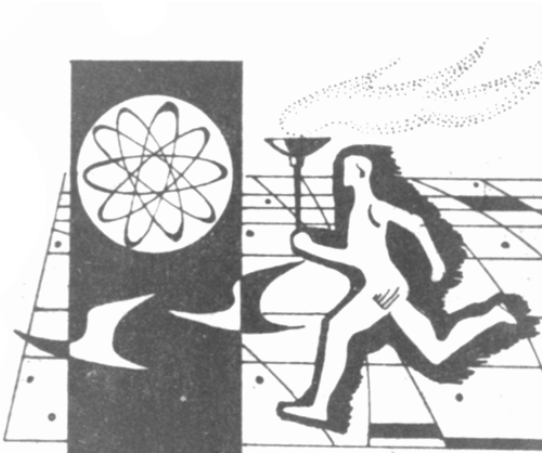
决胜知识经济时代（二）

周丽琼 编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知识化生存的挑战 1
知识化背景下的心理危机 24
企业应对知识化挑战.....62
使人力资本增值 69
信息冲击和不确定性.....81
面对社会发展多样性.....112
提高创造力.....116
网上创业新时代 141
“在家工作”成为可能.....151

知识化生存的挑战

“后资本主义”——知识社会中的富人与穷人

彼得·德鲁克(PeterDrucker)指出，今天已经出现了一种新形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他把它称为“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传统资源被描绘成资本、设备、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今天，最重要的资源却不是这些，而是知识。这实际上是知识经济的另一种说法。

那么，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长期困扰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阶级斗争问题会消失吗？会不会再出现失业？

当旧的经济体系向新的知识经济体系转变时，有一些长远的社会问题值得考虑：

新旧经济体系的转换将造成劳动力的结构性社会错置。

农业就业人口在本世纪刚开始时为 90%，如今只剩下了 3%。今天，当纳许维尔(Nashvill)铸造厂关闭时，失去工作的劳工却无法在北方电讯的工厂找到工作，因为北方电讯劳工的平均学历相当于社区学院。事实上，我们正进入一个对那些失去工作的劳工和他们家人毫无慰藉之用的新经济体系。为了这个新的经济，我们要如何处理这样的新工作形态以及新知识基础的变迁呢?

最近的趋势显示了一个贫富差距的两极现象。在美国前 20%的富有家庭中,每户收入至少在 18 万美元以上，而这 20%的有钱人，却拥有了全国 80%的财富。

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的现象在美国——这个领导性

的新经济国家，发生的速度比任何国家都快，也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快。当然，大家都愿意见到这样的发展，但是,这样的趋势有可能倒转回去吗?一个构思不良的信息高速公路和数字化经济的转移，可能助长了两极化的社会，也制造了一道鸿沟，横亘在那些拥有信息和无法拥有信息的人们之间，在那些得以与世界沟通和无法与世界沟通的人们之间。当信息科技对于经济的成功和社会的福利更加重要时,“ 信息的阶级制度 ”也变得愈加明显。

未来的信息服务费用可能会使社会中低阶层难以负荷。纽约法律学院的媒体研究中心主任艾伦·海蒙德说：“ 罪犯某种程度上，如果你没有钱，你就没有使用权。”

美国《大众科学》月刊 1994 年 5 月号刊登迈克尔·安托诺夫等人的文章《信息高速公路指南》中说，人们的担心是：信息高速公路的入口将会自然而然地倾向“ 信息隔离 ”和“ 电子歧视 ”, 从而会加剧美国社会阶级分化的趋势 “: 信息的有无可能会进一步拉大中层和上层阶级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差距，以及加剧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贫富两极分化。”

美国副总统戈尔也指出,信息高速公路应该提供‘ 普遍的服务 ”;“ 为全民服务 ”;“ 让穷人进入信息高速公路 ”, “ 防止出现信息贫富不均等的社会 ”。通过促进网络服务公司之间的竞争，对一般用户的服务费已降到仅平均每月 20 美元，只占一般美国人工资收入的 1%。互联网的用户已逐步扩大到低收入阶层。就象汽车进入普通家庭一样，将来，信息高速公路的用户也可能会经历同样的历程。

1997 年 1 月,美国副总统戈尔在接受(PCWeekOnline)

的专访中提到：“ Internet 是继印刷媒介之后对人类通信方式的最大改变。20 年前，当我还是国会成员时，我就梦想有一天，一个小姑娘可以用电脑从家中或学校里接收到 Internet 上的广泛资源。我想象她可以用电脑进入国会图书馆。今天，这一梦想已成现实。”

美国政府关于“ Internet2 ”的动议，目的是想让美国最小、最穷的学校也将能使用最大、最富的学校的资源。克林顿总统宣布的 E—Rate 计划，使得每间教室和每个学生都能支付得起访问 Internet 的费用。

被告席上的微软——会出现私人信息垄断集团吗？

很多人担心，这场信息革命，会不会形成一个利用电脑、互联网络和有线电视来统治世界的知识阶级？会不会出现垄断信息的全球性私人集团？

发展国际互联网和信息高速公路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其本质在于体制和观念的问题，在于信息化本身所带来的社会化、大众化、个人化和民主化、开放化与传统的私有制及社会价值观念之间的矛盾。美国 1934 年颁布的“ 联邦通讯法 ”规定有线电视业不得经营电话，电话公司也不得提供电视节目。显然，这一规定阻碍了信息经济的发展。1994 年 6 月 28 日，美国众议院以 423 票赞成、4 票反对通过了电话公司和有线电视公司将分别获准进入对方经营的业务范围的法案。同时，众议院有以 423 票赞成、5 票反对通过了区域性短途电话公司将被允许提供长途电信服务并可制造电信设备的法案。这些法案生效后，有线电视公司将可以开设短途电话服务，区域性短途电话公司也将能够编制自己的电视节目，从而打破行业和区域子网络的分割。

然而，矛盾并未就此解决。1998 年 5 月 18 日，美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国司法部即 20 个州政府向华盛顿哥仑比亚特区地方初审法院提出诉讼，指控美国微软公司利用其在电脑操作系统软件上的垄断地位，采取非法手段打击压制其竞争对手，限制消费者的选择，违反了 1890 年通过的联邦反托拉斯法。拥有 2000 亿美元资产的微软公司，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软件制造商，其生产的视窗软件为全球 90%的个人电脑所使用。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桩反托拉斯诉讼案。

美国司法部及 20 个州政府起诉微软公司的中心问题是：该公司凭借其巨大的市场优势，试图进一步扩大其在电脑操作系统软件上的垄断局面，并将这种垄断扩展到其他领域。对微软公司的具体指控包括：一、微软公司在将“ 视窗 95 ”及其后续产品“ 视窗 98 ”软件卖给电脑商时，要求他们把微软生产的“ 因特网探险者 ”浏览器也同时装入电脑，这种捆绑销售的做法意在垄断网络浏览器市场，违反了反垄断法。二、微软公司要求电脑制造商采用统一的启动程序，大大限制了制造商为消费者提供微软公司的竞争对手的产品。三、微软公司与主要的因特网服务公司签订了协议，禁止这些公司推销其竞争对手的产品。其中争议最大的是问题公司在其‘ 视窗 98 ”软件中，免费向消费者提供该公司生产的网络浏览器。批评者认为，微软公司已经占有了绝大部分的视窗软件市场，现在又免费赠送浏览器，必将导致对浏览器市场的垄断。微软的最大竞争者网景公司已深受其害，其在世界浏览器市场的占有率已从 90%下降到 60%，销售量减少了 6800 万个。美国司法部从 1997 年底就开始援引反垄断法的有关条款对微软公司进行了调查，认为微软公司的上述做法是非法的、反竞争的，微软公司利用

这些手段来摧毁其市场竞争对手违反了反托拉斯法。美国司法部给微软公司摆出了两条路：要么微软公司将其主要竞争对手网景公司的浏览器“导航者”软件装入“视窗 98”，以给消费者选择使用的权利，要么拆除“视窗 98”操作系统中的“探索者”浏览器。双方就此问题进行了谈判，但谈判于 1998 年 5 月 16 日破裂，从而最终导致了这场政府与微软公司之间的官司。

英国网络文化分析家，《数字化商业》的作者雷·海蒙德曾酝酿写一本书，书名叫做《比尔·盖茨不会成功》。在这本书中，海蒙德计划展开一场讨论，说明全球性网络对于我们未来的重要性，以及为什么不应该由任何一家公司来控制我们未来的技术前景。他还计划在书中证明，照此下去，不管比尔·盖茨如何向公众作出保证，微软还是会不可避免地把互联网络变成他们自己的资产。

然而，尽管有网景和太阳公司这样有力的竞争者，尽管有司法部及 20 个州政府的联名起诉，拥有 2000 亿美元资产的微软公司绝非寻常之辈。这场看来将马拉松式的世纪官司，不管其结果如何，都势必将对世界未来的技术前景的选择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

比基尼还是紧身衣——网络世界的自由与隐私

“信息想要自由（Informationwanttofree）!”黑客和网虫亮出了他们的旗帜。

“信息需要管制。”政府官员如是说。

“我们要知道政府在干什么!”自由主义者们呐喊着。

“这是政府机密。”政府官员拒绝道。

“你们要干什么，这是商业秘密，这是个人隐私!”

企业经理和普通民众愤怒地抗议。

“对不起，我是在执行公务。”政府官员回答。

这些纷乱声音反映出当今社会人们在信息控制问题上互相冲突、甚至自相矛盾的态度。

信息高速公路有着令人不寒而栗的潜力，以一种前所未有及千军难挡的态势来破坏人类的隐私。多数人都相信,我们有权力决定自己想要透露什么样的个人信息、透露给谁以及为什么透露。我们同意有时为了争取服务、贷款等等，而必须将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细节透露给政府和企业，但是，这些个人信息应该只是被用在原来同意的那些目的上，而且不能够卖给任何人。同时，如果要求不合理，我们随时可以说“不”，而拒绝给予信息。但在信息高速公路上，未经检查、未经控制，很可能就失去了这样的思考判断。当人类的沟通、商业交易、工作、学习和游玩在网络上逐渐增加，令人无法想象的信息种类和变量变成了数字化和网络化，我们又如何能在这样一个数字化的经济下保卫隐私呢?

但是，我们怎样平衡社会责任感和个人隐私权的矛盾呢?

例如，数字化现金应该完全是匿名的呢，还是法院授权的政府机构应该可以对我们的支付和收入进行追踪呢?

大多数业务经理会马上给出回答，因为以他们的观察，现在并没有完全的金融匿名——事实上金融匿名非常少。银行、信用卡公司、住房和储蓄社团，都有我们的储存、支取和单据记录，以及信誉交易。商人有理由相信,增加金融匿名的观点会导致经济的无政府状态(通常导致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与商务活动的需求相悖。

然而，在以后的几年里，你的商务活动可能越来越多地依靠网络通讯。如果你不使用网络通讯，你将承受不断增长的具竞争性的不利因素。这种不利因素最终可能摧毁(至少是弱化)你的公司。但正如前所说，网络与生俱来的是不安全。为达到普及、可承受以及自身复制的目的，网络的协议完全是公开的。你的竞争对手，若其成员中有一个知识丰富的黑客，就能截取你的通讯、交易和传送。这只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于是你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建立你自己私人的网络，一种是对你的通讯加密。第一种选择耗费昂贵且狠难发挥网络真正的广泛连通特长。第二种选择实际上是免费的，加密实际上也是不可破译的，哪怕最大的政府机构动用众多的超级计算机也不行。

今天人们在网上用信用卡购物已经使用了超级安全加密。但当你开始使用这种超级安全加密时，你已自动逃避了责任和可追踪性。想想在金融欺诈行为中这种加密的可能用途：法院和检察机关对复杂的金融欺诈行为已经狠难成功地起诉。如果每份文件再进行牢不可破的加密，审计的踪迹就消失了。困难变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匿名的、不可追踪的数字化现金允许每个人隐藏全部或部分收入和支出，虽然每个个体都能清楚地确认从他们那里提走的电子现金。

加密可以保护我们免受罪犯针对我们的掠夺，但它并不能保证我们自身行为的正当性。如果没有一些在规范方面的努力，我们都能毫不费力且不可追踪地逃税。

我们必须为公共服务和资产付费，商业也依靠个人对国家的责任感建立起来的税收经济来保证公平。在不规范和不征税的黑色或灰色经济里提供的货物和服务，

会损害社会及其支付合法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能力(和意愿)。这就否定了合法的公司利润和国家税收。

在现实世界里，大宗的现金交易不能完全匿名，因为匿名和绝对隐秘是犯罪的首要条件，出现这种情况就很可能被贩毒、敲诈、恋童癖和团伙犯罪的人所利用。匿名的、不可追踪的电子现金不只让个人逃税成为可能。想想它对黑市和盗窃货物市场的影响，特别是那些可通过网络传递的东西(盗版音乐、影带、图像、软件、书籍等等)。我能买任何东西并且是唯一能证明其为我所买的人。这种方式可能被警察、海关、税收或类似机构的代理者(agentsprovocateurs)所使用，但如果匿名电子现金被广泛采用,每时每刻都将有如此多的小额交易发生，这种调查对犯罪或黑市经济的威慑作用很小。

另一方面，我们又该如何平衡公共利益和公众的隐私权呢？该如何保护我们免受轻率的调查和没有根据的调查呢？

一些国家的政府仍以非常怀疑的态度看待交互网络。越南政府规定，只有第一流的科学家和学者才能使用交互网络。沙特阿拉伯、巴林和伊朗发明了复杂的过滤系统来对电子邮件进行检查，并把色情作品、宗教宣传和政治煽动材料拒之门外。

少数国家如法国有专门立法禁止其公民使用加密。

在美国禁止使用 RSA 型加密的法案虽然最终没有通过，但这项技术却仍被美国国家安全局列入“禁止出口装备”(armamentsprohibitedfromexport)的名单(与核武器同类)。

网上的数字化交易使非匿名交易很容易追踪。那些要求完全匿名和不可追踪的支持者最担心的是，最好情

况下，我们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在交易中被全部记录下来，使我们成功营销和直销组织的掌中之物；最坏情况下，政府会试图使用这种无上权力而达到极权。关于不可接受的数字化追踪应用，一个最常引用的例子是，国内税收机构在一年的时间里将对我们所有的金融交易进行监控，自动减除我们电子帐户中的欠额。这不是怪诞的想象，美国税收官员已经有很多这样的提案。

而另一方面，政府和大公司却在美国国内开始使用合法的(但不可出口)强大加密工具。

当看到这样的情形，美国程序员费尔·兹美曼感到政府、企业与平民之间权力的平衡正偏离他所崇尚的民主和自由。他编写 PGP 加密程序，PGP 以在美国以外的公共区域中 RSA 公布的密码运算方法为基础。他决定，以及洛杉矶一群自由主义者“ 密码朋客 ”(cypherpunks)通过网络把这个软件向全世界自由分发。

另一位美国自由主义者约翰·佩利·巴娄在给费尔·兹美曼的一本关于 PGP 的书所作的前言中解释了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政府的监视工具正变得越来越精良并导向集中。大型模式识别器可从如华盛顿或北京某地运用于网络，经特别协调后对某类活动进行识别。甚或是某类信仰。能自动生成每个公民秘密肖像的政府是一个赋予了绝对权力可能性的政府，用洛德·阿克顿的话说，最终将彻底垮台。越来越恐慌的权力主义者在血肉世界里以旧的官僚政治严阵以待，一旦他们手中掌握了这种能力，平民自由主义者几乎不能生存。以 PGP 和与之有关的数字化现金和匿名网络转信者等武装起来的平民就能从政府的雷达上消失。他们可以用很多方法有效地从统治下的社会里退出，进入到行动只由良知和文化管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社会。我们试过将踪迹藏于法律(这是欧洲人提倡的)后面吗?法律只能定义什么是数据库的适合内容。我们赋予过政府定义禁止知识的能力吗?我不赞成这种解决方案，对我来说听起来就像让窥视的汤姆(PeepingTom)安装窗户的百叶窗一样，我不信任政府有能力规范信息，特别是那些关于自己的信息，为了不愿别人知道而加入了很多控制。”

兹美曼在 1991 年完成了 PGP 的第一个版本,正值美国参政院考虑采纳关于禁止使用安全加密的法案。作为反应，兹美曼的黑客同事们在国际互联网上发放了这个软件，以便在新法案通过之前美国的用户能收到。因为一旦上网就不能围限，这个软件很快传遍了整个世界。

现在，这种加密软件可在网上免费得到，国际互联网上的很多网址都提供这个软件。它采用了名叫“公共匙、私人匙加密”’(publickey，privatekeyencryption)的概念，这个概念由斯坦福大学(Stanford)和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怀特费尔德·迪非和马丁·海尔曼发展起来的，后来又经 RSA 公司的瑞维斯特·沙姆尔(RivestShamir)和莱昂纳德·阿德曼(LeonardAdelman)等人完善。这种加密方法被认为实际是不可破译的，它依赖的数学方法，主要是采用了非常大质数，是公开的(published)，使他人有机会对其破译，或是找出方法中的缺陷。至今为止还没有数学家提出通过某种可行技术可对其破译。

这一举动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数字时代里最重要的政治行动。现在尚不能确定这个行动的中期或长期后果，但不管其结果的好坏，它都不可逆转了。

同时，创造真正不可追踪的(untraceable)、匿名的

anonymous)数字化现金的技术已经存在。其方法已由另一立自由主义者、美国的数学家和密码学家戴维·乔姆(Davidhaum)研究出来。为了保护民主和个人自由，他推崇现金的未来形式应该是,其运动不能被任何组织追踪、追溯或确定。

应该指出，从严格的理论意义上说，不存在完全不可破译的加密。用大量超级计算机和足够的时间，一天、一个月、一年——根据加密的程度总能够解码。加密程度由随机数生成中所用的“比特”数目决定。比特数越多，随机数据串越长，信息就越安全。但你应知道一批超级计算机是无法想象的昂贵资源，只有少数组织和国家才拥有。为这样的解码工作花费上百万美元(如果用了很长的比特串就有可能要花费几十亿美元),只是为了破译一个密匙——如果我用不同的密匙将我的信息分为两部分或更多部分加以发送，破译过程又得重新开始，这就是“实际上不可破译”这句话的含义。除非是最严重的情况，否则解码的企图根本不可行。

另外一些因素也使对 RSA 型加密的常规破译事实上不可能(除非纯数学上对大质数理论有重大突破)，那就是可对信息进行双重和三重加密。部分信息可以隐藏到许多清白的但加了密的其他条目的部分中，加密的信息就可在网上自由传送,那些想用常规解码手段解密的人，即使要判别哪些信息应处理都不可能，更不用说对付信息本身。

交互网络无疑是一种新事物，一个独立世界。它对我们的社会定义提出了挑战,使地理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并不知不觉地破坏我们始终赖以约束行为的习俗、章程和法律。交互网络迷们认为这简直是好极了，希望掌权

者松手。但对社会秩序和遵纪守法负有责任的许多政治家和司法当局则不表示赞同。这意味着交互网络将受到控制。唯一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有效地加以控制。

最有可能的是由立法来解决这一问题，通过立法禁止银行签发匿名数字化现金，或限制合法交易范围。然而，若依靠警察，这样的立法对社会来说将被证明是超级昂贵的耗费。人们手中的武器威力太强大了。

也许问题的解决应该是建立一种在个人隐私权和社会责任、公共安全与公众知情权、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作出一种适当的平衡的社会机制。只要不同意见的人们之间总是斗争多过合作，争吵不休，那么我们将永远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政治信息策略家——未来的政治斗争

国家的权力历来总是建立在对暴力、财富和知识的掌握之上的。而今天所不同的是三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建立在电脑、网络和信息通讯基础上的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的迅速崛起，使得政治生活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依赖于数据、信息和知识，而数据、信息和知识也变得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具有政治性。我们正在进入信息政治时代。

信息和通讯手段的巨大发展是人类历史进程中一个不容质疑的重大事件，它彻底改变了全世界的社会、政治和文化面貌，使得社会结构的所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事实上，如果知识是一种看法，是同意或不同意，是一种选择，那么拥有适当的信息则是人的自由的一个基本方面。由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越来越依赖数据、信息和知识，人们对于数据、信息和知识所包含的权利意义也越来越敏感，对信息权利和知识权利的要求也越

来越强烈。

然而，信息流动对传统的权势者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因此，从家长到公司总裁、再到一国的统治者，都要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控制知识的数量、质量和分配。今天，在迅速变化的富裕国家中，虽然有收入和财富的不公平，但即将来临的权力斗争是知识的分配和获取的斗争（美国，网上色情问题），而且将愈演愈烈。

对政治来说，重要的是权力，而不是真理。政府决策往往不是基于“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研究和透彻的理解，而是基于对各自自身利益的追求。高明的政治家和官僚心里十分清楚：数据、信息和知识都是可以用来攻击对手的武器。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并不能消除这种权力斗争，反而将它们推向了更高层次。

任何信息的全部内容都不会原封不动地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事实上，信息最为重要的政治内容也许就在于其处理过程中发生的种种变化。在任何民主制度中，限制政府的保密范围和让公众享有知情权都是必要的。但这仅仅是极小的第一步。为了真正看透这些文件，我们必须知道这些文件在政府官僚机构内部从一个人手中传到另一个人手中，从这一层次传到那一层次，从这一部门传到另一部门的传递过程中是怎样被歪曲乃至篡改的。

今天的政府越来越依靠电脑内储存的数据库。同时，控制这些数据库的日常权力都掌握在精通信息处理技术的专业人员手中。政治领导人和官僚们越来越意识到自己今天对信息技术的依赖。身居高位的领导者的决策，从作战飞机的选择到税收政策的拍板，都是根据那些使用计算机的信息专家所处理过的“事实”来进行的。

在信息处理过程的每一点上，从数据库的建立到信息资料的分类，信息可以被巧妙地和通常是无形地自由操纵。传统的政治信息传播策略与之相比，显得十分简陋和笨拙。因此，政治家们与专业人员联起手来，共同发动了政治斗争领域内的信息战。在政治家身边的智囊团中，除了传统的谋士和政治策略家外，出现了一个新人物——政治信息策略家。

政治信息策略家们并不追求学术上的“真实“或者甚至只是简单的准确。他们在寻找的是用于政治信息战的弹药。只要能把对手击败，数据、信息和知识不一定是“准确”或“真实”的。政治信息策略家对数据库的控制并不是限制他人的存取，而是首先决定哪些信息输入或者不输入数据库。

美国使用的十年人口的调查表必须经国会通过。一位高级人口调查官员说：“国会对我们施加各种压力。我们对农场财政状况进行了抽样调查。但国会要求我们不要收集那些数据，因为可能会被用来消减联邦对农民的补助。”每一行业的公司也在对人口调查局施加压力，要求它调查或者回避调查某些问题。

因此，不管信息的收集、储存和处理是多么电脑化，不管看上去是多么的“客观”，数据库确实反映了社会的价值取向和权力关系。

控制数据库的信息输入还只是最简单的信息策略。更为微妙的办法是控制数据的类别和分类的标准。今天，采用了先进的系统对进入电脑数据库的数据编制索引，确定密级和进行分类。由于电脑的辅助，同样的数据可以用不同方法“剪裁”或者再分类。这样，激烈的政治斗争就集中在日趋模糊、抽象，似乎是技术性的问题上。

许多权力斗争就围绕着数据库中具有代表性的标准以及它们所包含的实际意义而展开。极易统计的医院病床数有时被认定为社区医疗服务水准的标志。但每 1000 位居民中的医生的比例数会是更好的衡量标准吗？这两项中任何一项能表明当地居民多少确切的健康状况呢？病床数量可能表明政府的健康津贴项目的大小，这些项目是根据床位多少而不是根据社区提供真正服务的多少来奖励或者惩罚医院的。为了了解公众健康状况的全貌，是否需要统计病人人数？各种疾病的治愈率？社区居民的预期寿命的长短？婴儿的死亡率？一个标准或者是一组标准的选择都将会大大影响其结果。

信息策略家熟知“用什么来衡量就得到什么”这一套。

高级官员很少有时间和兴趣去理解任何事件中的隐含问题。由于他们不知道这些问题，又缺乏透过大量信息发现实际情况的必要训练，所以决策者不得不更依赖技术专家们。回答公众问题的专家组、政府调查小组、游说人员以及其他人时常纠缠在这些问题上。有的人不够精明，无法提出深入透彻的问题或者理解问题深藏的意义。而有的人却精于此道。他们这样做，通常是为自己的政治利益、部门利益或商业利益服务。尽管这种斗争使用的是高度技术性的语言，但实际上常常带有强烈的政治性。

依赖由不同类型专家制定出来的复杂规则，对这些规则加以衡量、标准化、系统化，并输入电脑来辅助决策。我们可以预期同样的技术可能在整个政府内推广——包括政治生活本身。政治决策常常是在一大堆情况作基础时作出的，包括复杂的、含糊不清的、相互关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